

陸豐客家下南洋的故事：〈渡臺悲歌〉續篇^{*}

白偉權

馬來西亞新紀元大學學院中文系助理教授

韋煙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教授

徐勝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退休教授

摘要

客家先民歷經多次遷徙，其目的在於尋找較好的生活環境。遷移途中篳路藍縷披荊斬棘，必定遇到不少困難。近年在臺灣流傳的〈渡臺悲歌〉歌仔冊，經多方訪查，發現這是一段客家二次移民的故事。根據研究者等所撰〈清代陸豐客家渡臺的歷程——〈渡臺悲歌〉及〈渡臺帶路切結書〉的聯想〉一文的考據，〈渡臺悲歌〉是彭氏次子彭堯梅，在父兄出外打拼未歸，僅留自己與老母親及年幼小弟多人，在新竹居地十分無助之下的感傷寫作，歌詞約在 1825 至 1834 年間完成。

陸豐河田彭姓家族保留一份記載，說明彭瑞瀾與陸豐河田原鄉三位兄弟往印尼謀生。此後新竹彭氏家族失去音信，河田祠堂雖在解放前還收到印尼匯來的祭祀款、也列出四位裔孫名字，但此後也失去聯繫。據稱他們僑居在音似「金山邦嘎」的地方，本文尋線往東南亞保有陸豐方言與彭氏族聚的地區訪查，以了解彭氏兄弟可能的落腳地點，以及他們的維生方式。

由於彭氏兄弟移民的年代久遠，本研究尚未尋得他們的後人，但卻在原來彭氏兄弟在南洋遷居的地區，即廖內、馬來半島南部和西加里曼丹一帶，見到不少彭氏宗親會，反映了當地聚居了不少的彭氏居民。這些地區的移民往來密切，在歷史及社會上屬於同一個整體。本區彭氏族人在祖籍分布上，也以陸豐籍為主體。透過將彭姓所屬的氏族和祖籍身分將該群體納入當地的華人地方社會脈絡，多少能幫助理解彭氏兄弟在南洋移居地的社會位置。

關鍵字：渡臺悲歌、客家遷徙、陸豐河田、二次移民、東南亞客家

壹、前言

〈渡臺悲歌〉是一份具有方言學、歷史學、社會學與族譜性質的文學作品，歌詞作者敘寫了遷臺的詳細路線、過程、對當時臺灣社會的所見與觀感等。自從黃榮洛先生將歌詞收錄並出版後，¹ 學者們紛紛解讀其歌詞內容，以期能更深入瞭解清代客家渡臺的歷史與文化。更有學位論文以〈渡臺悲歌〉作為寫作的主題，曾學奎的碩士論文，² 討論歌仔冊的創作背景、創作年代、遷徙路線等，也刊印許多原版文件。黃菊芳的博士論文《客語抄本〈渡臺悲歌〉研究》，³ 比對了現存不同版本的歌詞，論述歌詞中的客家文學內涵。由此可見這份文獻是臺灣客家移民的重要史料，對後續研究貢獻甚大。

無獨有偶，黃榮洛先生的《渡臺悲歌：臺灣的開拓與抗爭史話》也刊出了一份〈渡臺帶路切結書〉。該切結書是新竹芎林彭瑞瀾家族所有。〈渡臺切結書〉訂立於嘉慶9年（1804），雖僅150餘字，卻載明人、地、時、事、物諸項要素，是陸豐彭瑞瀾家族與帶路人羅亞亮的約定書，批明渡臺費用、交易銀兩（花邊銀）、付款細節等。研究者等人等所撰在前一篇文章〈清代陸豐客家渡臺的歷程—〈渡臺悲歌〉及〈渡臺帶路切結書〉的聯想〉一文，將渡臺悲歌參照切結書內容，把時間推延至渡臺後20-30年，把空間延展到新竹居地，則〈渡臺悲歌〉正是彭氏家人渡臺的經歷與遭遇。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的主人翁彭瑞瀾與部份家族成員最終並未在臺灣終老，根據陸河原鄉的資料得知他們後來前往南洋謀生，最後在當地落地生根，牽引出一段陸河—臺灣—南洋二次移民的故事。

* 本文得以完成，感謝下列熱心協助人士：

臺灣：黃榮洛、彭發勝、彭康庭、彭聖宏、彭鈺明、楊秋賢。陸河：彭武雄、彭武年、彭秉忠、徐國軍、徐永陸。
馬來西亞：彭永勝、彭志倫。印尼：彭孟君。

1 黃榮洛，《渡臺悲歌：臺灣的開拓與抗爭史話》（臺北：臺原出版社，1989年）。

2 曾學奎，〈臺灣客家〈渡臺悲歌〉研究〉（新竹：新竹師範學院中文學系碩士論文，2003年）。

3 黃菊芳，〈客語抄本〈渡臺悲歌〉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8年）。

在整個臺灣漢人族群移民史的研究範疇當中，研究傳統是由閩、粵原鄉渡臺逐漸轉移至臺灣島內的人口移動。在臺灣客家人二次移民的議題方面，研究成果已相當豐富，當中主要可歸納為兩大主軸，其一是臺灣西海岸地區間的人口移動，例如由北臺遷移至桃竹苗地區，或是在日治時期由北部移民到中、南部，從北部客家在地化成為南部客家。⁴ 其二是由西部地區往東部移民，成為東部的客家。⁵ 由此可見，有關臺灣客家二次移民的討論當中，長久以來是以島內移民為主，臺灣遷往東南亞二次移民的案例是較少見的。將臺灣的客家研究納入東南亞的範疇，可以藉由不同區域的資料累積及比較，建構出「客家族群」的多元視野。

彭氏兄弟音訊全無，所幸近年由於資訊流通發達，對南洋華僑的移民史，有更詳細的披露。在相關報導中，發現印尼邦加一勿里洞地區的華人社會，以陸豐及五華祖籍者居多，早期也都在荷蘭人控制的錫礦場打工，這些人原想賺些家用後便回祖居地，稱之為「移工」。但沒料到工資微薄，以致有些人連回國船費都籌不出來，這種境遇可以合理解釋彭氏父子為何沒能歸家團圓的原因。本文主要討論彭氏兄弟兩次移民的背景、下南洋後可能的落腳地點、維生方式，以及他們的境遇。

貳、清代陸豐原鄉概況

竹塹地區的客家人來自陸豐者居多，在此讓我們先簡介清初兩岸人文與

4 洪馨蘭，〈臺灣屏東市頭分埔北客的聚落化過程及其能動性〉，《全球客家研究》第 5 期（2015 年 11 月），頁 35-84。林秀昭，〈臺灣北客南遷研究〉（臺北：文津，2009 年）。鍾肇文，〈客家人移民臺灣中南部史〉（屏東：梁慧芳出版，2009 年）。賴文慧，〈臺灣汀州客二次移民研究：以苗栗縣造橋鄉平興村謝姓家族為例〉（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9 年）。羅烈師，〈臺灣客家分布與島內遷徙之再討論：以饒平篤祐堂七藍周姓彰化平原移民北遷新竹湖口為例〉，收錄於莊英章、黃宣衛主編，《客家移民與在地發展》（南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18 年），頁 165-192。

5 潘繼道，〈漫談東臺灣客家移民史〉，《臺灣學通訊》第 17 期（2008 年），頁 2-3。孟祥翰，〈日治時期花蓮地區客家移民的分布〉，《客家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中心，2002），頁 129-158。黃學堂，〈日治時期臺東地區的客家人〉，《臺東文獻》（復刊）（第 10 期，2004 年），頁 3-29。

地緣背景，包括陸豐地名沿革、渡臺禁令與臺灣人口、竹塹內山的拓墾概況、臺海帆船交通與對渡港口、以及渡臺過程中的海上風險傳說等。瞭解陸豐與竹塹地區的時空演變，有助我們把〈帶路切結書〉及〈渡臺悲歌〉的內容，切入到清代客家渡臺歷史來討論。

一、陸豐地名沿革

雍正9年（1731），清政府從海豐縣析出陸豐縣，管轄吉康都、方廓都、石帆都三都，縣治設在東海。新竹地區的陸豐客家，以吉康都為多，包括河口、河田、水唇、東坑、螺溪、上砂、下砂、五雲等地。1965年，廣東省政府將陸豐縣上砂、下砂、五雲等地劃入揭西縣。⁶1988年再析陸豐縣北部地區（相當於吉康都大部分範圍）建陸河縣，屬地級汕尾市管轄。1995年改陸豐縣為陸豐市。

河田、東坑、水唇等地之居民，因臨近榕江南河上游，他們步行到河婆鎮的橫江口，由此乘船抵汕頭，再沿海岸東行到饒平柘林港，在此等候大船前往臺灣。1804年彭氏一家人，便是沿此途徑渡臺的。

二、渡臺禁令

滿清入主臺灣後，因粵東籍人士曾協助抗清活動，政府乃將粵籍客家遣返原籍，並頒佈〈渡臺禁令〉，不准攜眷渡臺。乾隆13至53年（1748-1788）之渡臺禁令時鬆時緊，到同治13年（1874）年才依沈葆楨之議，正式廢止禁令。推測嘉慶以後，已不嚴格執行禁令。

清代兩岸貿易航運，在康、雍、乾年間，以鹿耳門與廈門為對渡港口；乾隆55年（1790）之後逐漸放寬。道光初年，臺灣「私口」繼續增加，沿岸商艘絡繹往來。

6 胡捷、何忠蓮編，《新世紀廣東省地圖集》（廣州：廣東省地圖出版社，2007年），頁248。

柘林港比汕頭港早開發，為明、清時期粵東及閩西南對外通商的重要口岸，坊間有「未有汕頭埠，先有柘林港」之說。清初在〈渡臺禁令〉影響下，渡臺者須領取照單，然而多數還是以私渡為主。一般私渡者採取兩種方法；一為僱用漁船逕自渡海，一為在大港近海攔搭商船。前者行動較方便，但因船隻小，常有迷航及翻船事故。後者須在外港上下船，以迴避海關檢查。若遇無良船主，抵達臺灣海岸時，乘客常有被拋置在淺灘或沙洲上者，溺水事件頻生。

三、海上風險

閩臺之間隔著海峽，早期交通靠帆船，先民渡海風險甚大，臺灣民諺有云「三留六死一回頭」及「三留二死五回頭」等說法，常造成重大傷亡。除了柘林港之外，位在韓江三角洲下游的樟林港也有大船（紅頭船，又稱洋船）出海，當年偷渡的情況，據云每船百名至二百餘名偷渡來臺。⁷由於私渡活動頻繁，以至臺、廈兩同知，稽查莫及。即聞有拿獲通報者，亦不過千百中之什一耳。⁸

黃菊芳引《公案簿，第 7 輯》記載：在道光 4 年（1824）2 月時，有一隻紅頭船從樟林載客出發，海上航行 26 天抵達雅加達。船上有 503 名搭客，加上船員共 619 人。更大船隻連船員可超過 1,000 人。⁹黃菊芳引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云：¹⁰

例禁雖嚴，而偷渡者接踵。臣與督臣俱令先後查拏，或偷渡不成而被獲、或出港遇風而退回，計自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起，至二十四年十月止，一載之中，共盤獲偷渡民人二十五案，老幼

7 黃菊芳，《臺灣客家民間敘事文學：以渡臺悲歌與渡子歌為例》（臺北：南天書局，2014 年），頁 33。

8 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年），頁 325。

9 參聶德寧，《公案簿，第 7 輯》（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7 年）。

10 黃菊芳，《臺灣客家民間敘事文學：以渡臺悲歌與渡子歌為例》。

男婦九百九十九口；內溺斃男婦三十四口，其餘均訊明，分別遞回原籍。其已經發覺者如此；其私自過臺，在海洋被害者，恐不知凡幾。¹¹

由此可知，乾隆 23 年（1758）至乾隆 24 年（1759）年間的偷渡規模，平均每船有 40 人之多。偷渡者中，男女老幼都有，有出港遇風退回者、有溺斃者。偷渡不成被查獲者，分別遞回原籍，刑罰似乎不重。

參、〈渡臺悲歌〉內容

〈渡臺悲歌〉前半部記載了主人翁在來臺之後的困苦以及對與生活的種種不適應。由於原鄉生活困難，因此聽信水客的美言，移民到臺灣尋夢。作者以回憶的方式細緻地刻畫了主人翁來臺前對家裡的不捨，來臺的路線，價格，在路途中的遭遇。來臺後，則講述在臺灣工作的辛苦，以及對社會所見與想像的落差，最末頁則揭露作者故鄉及未竟抱負。故事內容與切結書人物有密切關係。本節我們列出歌詞首數頁，依其所述，繪製渡臺路線圖。之後，再討論船費及使用貨幣、在臺灣謀生情況、作者道白等內涵。

勸君切莫過臺灣 臺灣恰似鬼門關 千個人來尋死路 到來知死也是閑 就是窖場埔一樣
埋屍所在滅人山 臺灣本是福建管 一半漳州一半泉 一半廣東人居住 一半生番併熟番
生番住在山林內 專殺人頭帶入山 帶入山中食羊酒 食酒唱歌笑連連 熟番就是人一樣
理番吩咐管番邦¹² 百般道頭微末處 講著賺錢實是難 客頭說道臺灣好 賺銀如水一般般
口似花娘嘴一樣 親朋不可信其言 到處騙惑人來去 心中想賺帶客錢 千個客頭沒好死
分屍碎骨絕代言 幾多人來聽其說 隨時典屋賣埔園 單身之人還靠得 己多父母家眷連
涓定良辰和吉日 出門分別淚連連 別卻門親併祖叔 丟別墳墓並江山 家中出門分別後

11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戊編第二本》（臺北：中央研究院，1954 年），頁 108。

12 康熙 48 年（1709）設立的「北路理番同知」所管理的是熟番與化番，生番地是化外之地，不屬清政府管轄；同知對外自稱「分府」；理番同知是「管番官」。「理番吩咐關番邦」應為「理番分府管番官」之誤抄。

直到橫江就答船 船行直到潮州府 每人五百出頭錢 盤過小船晝一夜 直到柘林港口邊
 下了小船尋店歇 客頭就去請洋船 一人船錢貳圓半 客頭講愛四花邊¹³ 家眷婦人重倍價
 兩人名下加二元¹⁴ 各要現銀交過手 銀錢無交莫上船 恰似原差禁子樣 隨時反面無情言
 各人船錢交清楚 亦有對過在臺灣 大船還在港口外 又等好風望好天 亦有等到三二月
 賣男賣女真可憐 衣衫被帳都賣盡 等到船開又食完 亦有乞丐回頭轉 拾分冤枉淚漣漣
 也有不轉開船去 船中受苦正艱難 悶船嘔出青黃膽 睡在船中病一般 順風相送都容易
 三晚兩日過臺灣 下了大船小船接 一人又要兩百錢 少欠銀錢無上岸 家眷作當在船邊
 走下嶺來就知慘 前見人屋千百間

依歌詞內容，渡臺路線如圖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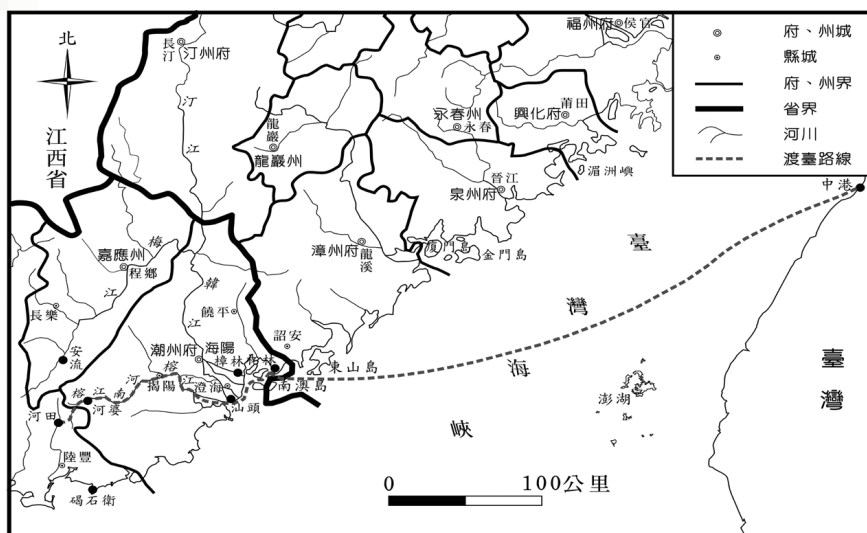


圖 1 〈渡臺悲歌〉作詞者遷徙路徑示意圖

資料來源：徐勝一、范明煥、韋煙灶，〈清代陸豐客家渡臺的歷程——〈渡臺悲歌〉及〈渡臺帶路切結書〉的聯想〉，《新竹文獻》第 63 期，2015 年 10 月，頁 53-78。

一、所屬空間

歌詞中，作詞者提及了當時臺灣的居住環境，是「一半漳州一半泉，一半廣東人居住，一半生番併熟番，生番住在山林內，專殺人頭帶入山」，

13 即四個花邊銀圓。

14 此四句，本文認為彭版之數字合理，故引用之。

這一敘述為嘉慶道光年間新竹內山地區的典型寫照。此外，作者從原鄉陸豐河田出發，沿榕江南河直達潮州汕頭，再從汕頭往西南從柘林港出發前往臺灣。柘林港與臺灣中部約有 500 公里，以帆船每天航行 200 公里的話，所需時間為兩天多，相當符合悲歌中「三晚兩日過臺灣」的歌詞。因此從原居地到客居地都是粵臺兩地的客家地區。

二、歌詞作者

歌詞用語及內容，多為陸豐客家之俗話，如：被鋪蚊帳、痾濃滑血，以及農具名稱：米槌、椿臼、摩蘭、禾槌、穀桶、禾排等，很生動地描述當時的生活環境及農耕狀況。能寫出這樣的歌詞，必須有基本的私塾教育。下列為作詞者的自白（錄自彭發勝抄本）：¹⁵

借問此書何人作 原鄉陸豐近河田 一筆寫成俗世語 六親門見可流傳
三十年前時運轉 立馬回頭看狀元 月過十五光明少 龍虎相會萬萬年

在這八句文字中，作詞者表露他的籍貫、年齡、及教育程度。他自稱是陸豐河田人，自認三十年前若留在家鄉參加科舉考試，運氣好的話，現在可能就是狀元郎呢！可惜青春已逝，如今年歲已大、身心已衰，就如過了十五的月亮、光華退卻，當官晉爵之事只能在夢中去尋覓啦！我們若把這段歌詞，視為切結書中彭瑞瀾兒子所作，則兩文內容可以完整銜接。果若如此，歌詞創作者是誰？創作年代？為何如此怨嘆？我們庶幾可得到合理的解釋，解析如下節。

肆、〈渡臺帶路切結書〉

一、切結書內容

黃榮洛書中刊出一份〈渡臺帶路切結書〉（如圖 2 所示），記載彭瑞瀾

15 彭發勝，《勸君切莫過臺灣》，漢學教材由九芎林工作坊羅文生數位化存檔（2014 年 /1938 年）

一家九口，包括夫妻兩人及七個兒子，其中三個為幼子，由親戚羅亞亮帶路渡臺，言明船資總共三十一圓花邊銀，由彭瑞瀾兄長彭瑞清代筆立約，時間為嘉慶 9 年（1804）正月二十五日。全文如下：

立請約人彭瑞瀾，今因闔家男婦老幼共九人，要往臺灣路途不屬（熟）前來請到親羅亞亮親帶至臺灣。當日三面言定，大船銀並小船錢總鋪插在內，共花邊艮參拾壹員正，其銀至大船中一足付完，其路途食用並答（搭）小船盤費系瀾自己之事，此系二家甘願不得加減，口恐無憑，立請約付照，批明九人內幼子三人，見請代筆兄瑞清。嘉慶九年正月二十五日立。¹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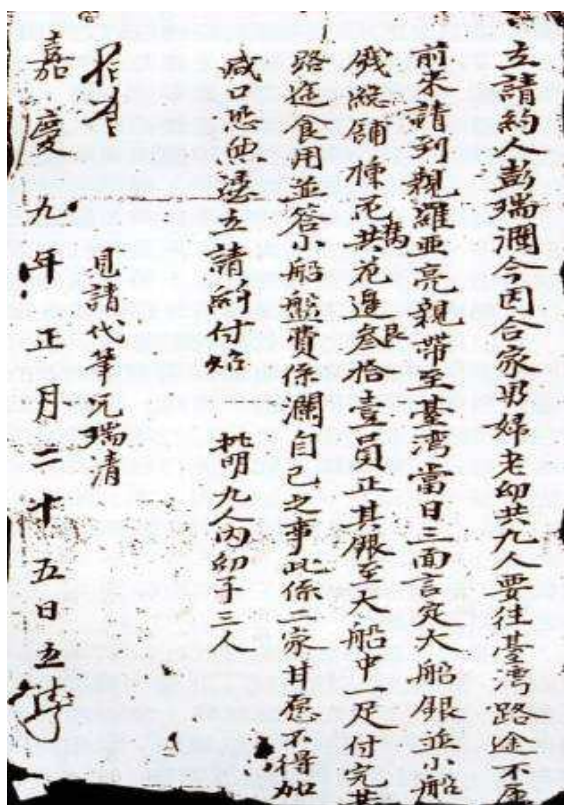


圖 2 〈渡臺帶路切結書〉

資料來源：黃榮洛，《渡臺悲歌：臺灣的開拓與抗爭史話》（臺北：臺原出版社，1989），頁 59。

16 此契約書（黃榮洛提供拍攝）為彭瑞清簽字，由羅亞亮收存；另一份由羅亞亮簽名者，應保存在彭家。陽曆 1804 年 3 月 2 日立據。

二、彭瑞瀾家族

切結書中之彭瑞瀾及羅亞亮，兩人為親戚關係，經查係居住在今之陸河縣河田鎮火山下附近。在臺灣，《彭氏大宗譜》¹⁷載有一頁新竹芎林彭瑞瀾派下世系表，即是切結書中的彭瑞瀾家族。¹⁸芎林世系仍維持陸豐硤頭祠「瑞、堯、舜、禹」的排輩傳統，¹⁹河田彭瑞清後裔彭武雄先生，²⁰證實彭瑞瀾渡臺之事。

三、渡臺銀兩

切結書約定「大船銀並小船錢總鋪插花在內，共花邊艮（銀）參拾壹員正，其銀至大船中一足付完，其路途食用並答（搭）小船盤費系瀾自己之事」，意即此趟渡臺之旅，彭氏一家九口，支付大船及接撥小船之船費，共花邊銀 31 元正，不包括路途食用及其他盤費在內，而且言明上大船時一次付完，此約定與歌詞內容相近。

伍、〈渡臺悲歌〉與〈渡臺帶路切結書〉的關聯性

研究者認為〈渡臺悲歌〉與〈渡臺帶路切結書〉兩份文件有相當大的關聯性，本研究也曾對此進行討論，²¹認為切結書於嘉慶 9 年（1804）簽立，而悲歌係於道光 5 年（1825）後寫成。底下就原籍地與居住地、價錢與貨幣、渡臺過程和感傷原因四點進行解析：

17 莊吳玉圖編，《彭氏大宗譜》（桃園：百族姓譜社出版，2008 年），頁 468。

18 據陸河縣彭瑞清後裔彭武雄的口述：瑞瀾通瑞欄、瑞瀾、瑞蘭、瑞瀾等同音字。《延年頌》誤刊為瑞棟。彭氏水唇籍敦親睦族基金會編，《延年頌》（陸河：彭氏水唇籍敦親睦族基金會，2005 年），頁 42。

19 陸豐彭姓硤頭祠以彭延年第 14 世彭崑山為開基始祖。

20 感謝陸河縣僑外辦主任彭秉忠先生的協助，找到彭瑞清後裔彭武雄。

21 徐勝一、范明煥、韋煙灶，〈清代陸豐客家渡臺的歷程—〈渡臺悲歌〉及〈渡臺帶路切結書〉的聯想〉，《新竹文獻》第 63 期（2015 年 10 月），頁 53-78。

一、原籍地與居住地

兩者的主角都是河田人。切結書主角彭瑞瀾為陸豐河田人士，而悲歌末尾兩句話也透漏了作者本身的原籍地，²² 顯示兩文件的主人翁都是陸豐河田人。此外，切結書主人翁的後人以及渡臺悲歌所敘述的地點亦同在新竹。²³ 根據 2005 年的統計資料，原鄉河田的彭氏為當地第一大姓，約佔了 21%，²⁴ 而這些陸豐彭氏族人來臺後大多落腳在湖口、竹東、北埔、芎林、橫山一帶。因此這兩份文獻很可能與彭瑞瀾家族渡臺有關。

二、渡臺價錢與貨幣使用

切結書載「三面言定大船銀並小船錢，總舖插花在內，共花邊銀三拾壹圓正」，而歌詞中所載大小船費之細目，以彭家九口成員來演算，總費用為 30.8 圓花邊銀，兩文件的金額幾乎相符。²⁵ 此外，雖然 19 世紀初以後臺灣除了官銀之外，也流行使用佛頭銀及花邊銀這些西班牙銀幣，而歌詞與切結書都使用花邊銀計費。這些鉅細靡遺的記載顯示作者很可能也保留了一份渡臺帶路切結書。

三、渡臺過程

兩者都顯示了渡臺的輾轉過程，包括旅途中必須要乘搭不同的大小船隻，以及渡臺時要償付予客頭帶路。以目前作者所掌握超過 400 套桃竹苗地區的客家族譜及文獻中，未出現過「帶路」的相關記載，唯有這兩份文件提

22 參彭發勝，《勸君切莫過臺灣》。

23 根據〈渡臺悲歌〉取得的地點，彭發勝抄本是由彭氏於 1938 年在新竹在竹北犁頭山下從一名彭姓鄰居取得，據研究與彭發勝之子彭康庭的訪查結果，得知鄰居彭姓年輕人為彭統生，是彭協春派下，年齡與彭發勝相近。此外，黃榮洛抄本的取得地點也是在新竹地區。根據黃菊芳的資料，另一版本陳健銘抄本是陳氏在臺北光華商場舊書攤所購得，因此確切來源不詳。

24 此為 2005 年的統計資料，見彭永琴主編，《客家陸河》，頁 345。

25 徐勝一、范明煥、韋煙灶，〈清代陸豐客家渡臺的歷程—〈渡臺悲歌〉及〈渡臺帶路切結書〉的聯想〉。

及帶路人及客頭。此外，切結書從簽訂到乘船來臺的時間與悲歌所載的「大船還在港口外，又等好風望好天，²⁶亦有等到三二月」大致相同。

四、傷感原因

作者寫到「三十年前時運轉 立馬回頭看狀元 月過十五光明少 龍虎相會萬萬年」，嘆命運弄人、與仕途無緣。作者是讀書人，若以切結書的時間 1804 年來臺，在離開原鄉 30 年後（約 1834 年，約 40-50 歲間），因遷居臺灣困頓，又失去仕途功名，而在同一時期恰逢新竹當地鄭用錫（1788-1858）中舉（1818 年）、中進士（1823 年）、進京為官（1834），悲歌作者自視為讀書人，與鄭同齡而不同運，乃作詞發抒愁情。在此期間，父兄又另往他處謀生未歸，要負起家中老小生計，因此格外感傷。比對兩文件事物的時間對應，其密切度相當巧合。

從上述兩份文件屬於同一地緣關係（河田—新竹）、同一金融時代（花邊銀）、同一移民方式（來臺的過程），以及抒發悲情時間的呼應來看，顯示切結書和悲歌很可能屬於彭瑞瀾家族的渡臺事件資料，先有渡臺帶路切結書，再有渡臺悲歌之作。

陸、探訪新竹與陸河彭氏家族

一、新竹地區的田野訪查²⁷

2015 年 3 月，研究者到新竹芎林訪問彭瑞瀾後裔。彭氏家譜詳載彭瑞瀾、妣葉氏、九個兒子的生卒年月、婚娶與墓葬情況。從切結書的簽定時間推算，渡臺時彭瑞瀾已 41 歲，妻葉氏 38 歲，長子堯松（18 歲）、次子堯梅（14 歲）、

26 臺灣海峽陽曆 6、7、8 月才有旺盛西南風。

27 感謝芎林鄉民代表楊秋賢先生及彭發勝公子彭康庭先生的協助與帶路。

三子堯生（12 歲）、四子堯鳳（9 歲）、五子堯浦（7 歲）、六子堯祝（6 歲）、七子堯申（4 歲）。也得知渡臺後，彭瑞瀾又生兩個兒子堯觀（1805 年 12 月生）及堯壽（1808 年 6 月生）（表 1）。

弔詭的是，作為家族在臺灣的開基祖，彭氏家譜中並未記載彭瑞瀾、長子堯松、三子堯生之卒年，彭家墓園也沒有三人之墓碑，而長子堯松及三子堯生也未有婚配記載。據家族耆老口述，渡臺時有一子在大船下小船時落海亡故了，推測可能是堯生。除此之外，新竹彭氏家族並未有進一步資訊。

表 1：彭瑞瀾家族渡臺第一、二代之出生年月及喪葬記載

人名	出生年	渡臺時齡	墓地	備註
瑞 瀾	1763（乾隆 28 年）	41	不 詳	
妣葉氏	1766（乾隆 31 年）	38	柑園崗	
堯 松	1786（乾隆 51 年）	18	不 詳	
堯 梅 妣曾太	1790（乾隆 55 年）	14	打磚窩	或為渡臺悲歌作者
堯 生	1792（乾隆 57 年）	12	不 詳	疑渡臺時溺水
堯 鳳	1795（乾隆 60 年）	9	打磚窩	
堯 浦	1797（嘉慶 2 年）	7	打磚窩	
堯 祝 妣田太	1798（嘉慶 3 年）	6	打磚窩	
堯 申 妣羅太	1800（嘉慶 5 年）	4	打磚窩	
堯 觀 妣詹太	1805（嘉慶 10 年）	1 年後於臺灣出生	打磚窩	
堯 壽 妣吳太	1808（嘉慶 13 年）	4 年後於臺灣出生	打磚窩	

資料來源：整理自 芎林鄉文林村彭有和先生提供之彭瑞瀾家族生庚簿（《請神書》）

二、陸河縣河田的田野訪查

研究者在 2015 年 6 月，第一次訪問河田中坑村，²⁸ 有幸與彭瑞清及彭瑞胡之後裔交談、並參閱家中保存的《延年頌》特刊。該刊載明：

十三世祖茂桂彭公娶妻兩陳，從葉江²⁹遷入中坑開基。生七子，瑞清，娶妻黃氏、李氏；瑞勇，娶妻福氏；瑞江，娶妻葉氏；瑞德，娶妻劉氏；瑞棟（按：應為瑞瀾）³⁰，娶妻葉氏；瑞胡，娶妻羅氏；瑞雲，娶妻葉氏。其中有四人遷到印尼崖城居住。留在中坑的瑞清生五子：元順、元泰、元魁、元春、元之。瑞胡生三子：元勝、元漢、元俊。居住在油和店的瑞勇生二子：雲開、雲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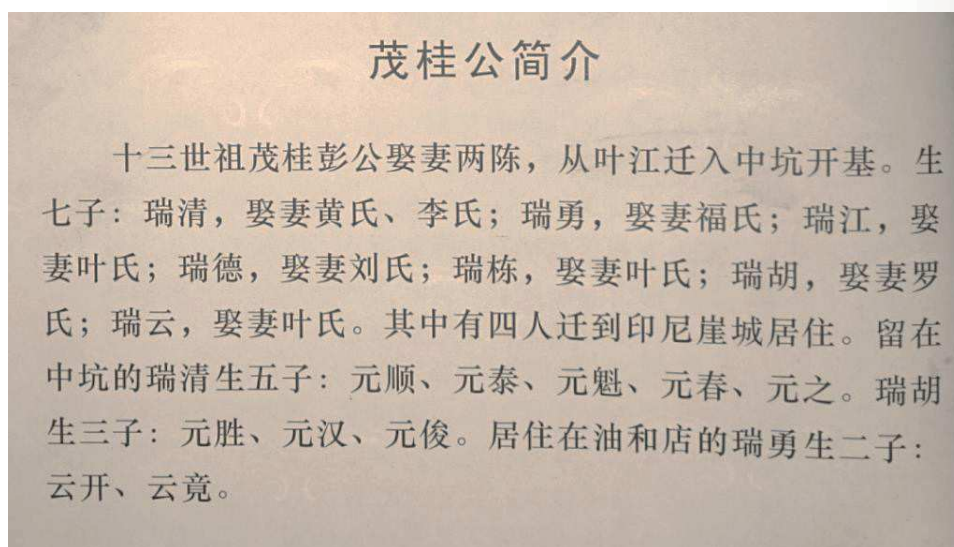


圖 3 《延年頌》彭氏茂桂公簡介圖片

註：瑞棟為瑞瀾之誤

資料來源：彭氏水唇籍敦親睦族基金會編，《延年頌》（陸河：彭氏水唇籍敦親睦族基金會，2005），頁 42。

這份特刊的內容，解開了彭瑞瀾沒有終老臺灣之謎，他舉家遷徙到新竹

28 感謝廣東省陸河縣外事僑務局吳何及彭秉忠兩位先生，及汕尾技術學院徐國軍老師的協助與帶路。

29 河田寶金村的葉江自然村，近石禾町。

30 彭氏水唇籍敦親睦族基金會編，《延年頌》。

後不久（1808 年 6 月魁子堯壽出生後），可能因為彭家初來乍到，食指浩繁家計困難，因此又帶著長子堯松與河田原鄉另外三個兄弟（瑞江、瑞德、瑞雲）一起到荷屬東印度群島（文後簡稱「荷印」）去打拼了。

這次訪問由於時間所限，有些問題來不及發問，便匆匆離開了。雖然已經得到關鍵答案，事後，繼續思索彭瑞瀾父子到印尼後的幾個問題：譬如他們回過家鄉否？那個年代印尼有何工作？

根據 2017 年陸河的彭武年先生口述指出，移民印尼的彭氏後裔沒有回鄉過，但他說在家族祭祀請神書中，彭瑞瀾的孫輩，十六世舜金、舜富、舜六、舜寶四兄弟的名字特別用紅筆框出，他們下南洋時，留下一塊田交給十七世統來公耕作，部分所得作為祭祖費用。此外，祠堂裡一位十八世阿公，一直有收到印尼宗親搭錢（匯款）回鄉，用來祭祀祖先，解放後就中斷了。搭錢回來的地名相傳為「金山邦嘎沙里洋」（*kim-shung-pang-kat-sha-li-i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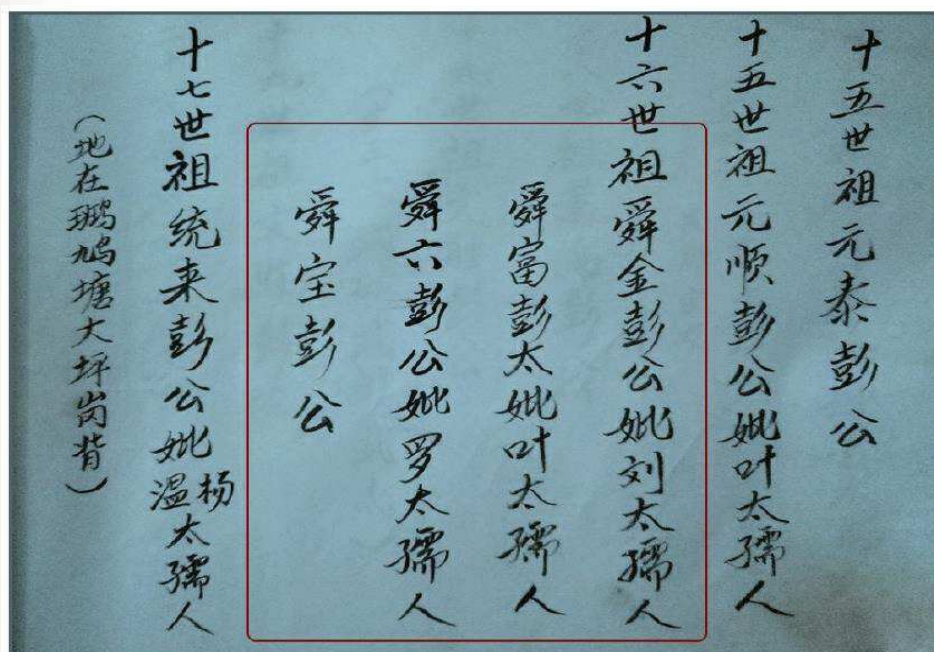


圖 4 陸河縣河田彭姓之彭瑞瀾家族祭祀請神書之內容

資料來源：彭武雄先生提供。

在新竹芎林及原鄉河田的訪問當中，我們得出渡臺帶路切結書與渡臺悲歌所展示出的意義與價值，其實不僅限於客家先民渡海來臺的一段歷史，更重要的是它勾勒出了一段二次移民的故事。底下，本研究試圖利用一些斷簡殘篇以及後來的資料，拼湊出彭氏家族移民至南洋³¹之後的圖像。

柒、彭瑞瀾父子下南洋的追尋

從上述我們得知彭瑞瀾在 1804 年到臺灣之後，大約在 1808 年至 1810 年代初，便攜長子返回故里連同三名兄弟前往荷印謀生。研究將在本節討論當時的荷印環境背景，荷印如何促使彭氏家族選擇前來作為二次移民的目的地？他們到荷印的出路可能有哪些？

一、19 世紀初的荷印

南洋一直以來都是閩粵漢人往外擴張移植的主要地區，南洋各地都能夠找到華人的蹤跡。19 世紀的印尼為荷蘭的殖民勢力範圍，時稱荷屬東印度群島，亦簡稱荷印或和印。彭氏家族之所以選擇前往荷印，其原因固然與鄉里的社會網絡關係或是個人際遇有關。但是當時期的的大環境對於彭氏家族二次移民路徑的影響亦不容忽視。

南洋雖是閩粵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但是在彭氏家族南來的 19 世紀初以前，南洋除了荷印之外，其他地區尚未進入大開發期，例如檳城直到 1786 年才正式開埠，其周邊地區如較早開發的普吉島也要到 19 世紀初才因錫礦而大規模開發。馬來半島中、北部則到 19 世紀中葉（1840 年代末）才陸續有較多的華人進入採礦，到了 1880 年代才出現大規模的華人移民潮。新加坡則於 1819 年正式開埠，同樣到了 1840 年代末，其熱帶栽培業才逐漸擴散至內陸和北部的柔佛地區。

31 當時東南亞一詞尚未出現，清代漢人多稱今天的東南亞為南洋。

反觀荷屬東印度群島，荷蘭在南洋的活動要比英殖民勢力來得早，荷蘭東印度公司早在 17 世紀初（1619 年）便在爪哇建立據點，並往周邊其他島嶼擴張勢力，同時也引進華人協助發展各種殖民經濟。到了 18 世紀，荷屬東印度群島已有相當多的開發區，例如 1740 年廖內便已經有華人在當地從事胡椒甘蜜的種植，同一時間點的蘇門答臘邦加島、勿里洞島以及加里曼丹的西部，當地在 18 世紀中葉至 19 世紀末這段期間也屬於大開發時期，統治者也引進了大量華人前來開礦，華人在當地也擁有自己的一套社會治理模式。由此可見，在 19 世紀初以前，荷屬東印度群島的開發普遍較馬來半島來得早，對於勞力的需求其實較其他南洋地區來得大。

二、荷印的客家地帶

在彭氏家族前往荷印的時代，當地大城市當中，華人人口當中當然少不了客家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荷印的客家人更多分布於上述所提及的礦區，例如邦加、勿里洞以及西加里曼丹地區，這些地區的客家人甚至是當地的優勢族群。

（一）邦加及勿里洞

在產錫礦的邦加、勿里洞方面，當地統治者已經有直接從廣東引進苦力開礦。根據 1849 年荷蘭官員對於邦加的調查，當地為客家人共有 4,178 人，其餘 278 人為福佬人，754 人為當地土生華人。³² 這個時期正好也是彭氏兄弟在南方打拼的時期。

在當地客家人的族群身分方面，根據林文映³³報導印尼客家尋訪心得，

32 Heidhues, Mary F. Somers, *Bangka tin and Mentok pepper: Chinese settlement on an Indonesian Island*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2), p. 43。

33 林文映，〈印度尼西亞客家巡馬〉，收入「香港客家文化研究會」網站：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MDM3Njc5MA==&mid=403440263&idx=1&sn=466ff1945196363fef656cbeb06a4d29&scene=2&srcid=0227qz0P2OomhnbPUiVpewSB&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wechat_redirect（2018 年 5 月 10 日點閱）。

她指出邦加勿裡洞的客家話近似陸豐、五華口音，他們先祖從廣東到此開採錫礦。勿裡洞島保有濃厚的客家傳統及語言，連賣榴蓮的馬來人小販，都能講一口像樣的客家話，反映該地馬來人與華人的族群融合良好。他們說「謝謝」是海陸詞彙的「承蒙你」（*shin mung ngi*），而不是梅縣的「恁仔細」（*an zhi se*），反映了當地以海陸豐籍為主的祖籍結構。³⁴

湯順利在〈聽印尼作家談家族故事：為什麼一個印尼的島上，會有這麼多的客家人？〉³⁵中提到：客語是邦加島華裔族群間通用的語言，本地福建人及廣東人能通客語，許多馬來族群亦能流利地使用客語。因此邦加語參雜著許多客語及馬來語。譬如礦業中說的錫砂溝（*sakan*）、鑽機（*chiam*）以及淘洗處（*tailing*）；另外還有像責任（*kamkai*）、倒霉（*soi*）、籃子（*sauki*）和紙袋（*cikok*）等，這些詞彙每天在家中、店裡、街上、礦坑中都會用上。

（二）西加里曼丹

在產金礦的西加里曼丹方面，該地區的三發（Sambas）早在乾隆5年（1740），其統治者蘇丹就已經引進華工，華人一般在河流下游的河口地區建立據點，再逐步往上游地區開墾，形成一處處的礦區，每一個礦區都分屬於不同的拓墾集團。而當地最著名的拓墾集團，要屬羅芳伯的蘭芳共和國（1777年—1884年）。羅芳伯原籍梅縣，在1772年便南來本區發展。

當地的拓墾組織都有顯著的地緣及血緣特性，例如大港公司（Thaikong），其組成成員主要來自陸豐與惠來，以吳姓、黃姓、鄭姓族人為主。三條溝公司成員同樣來自陸豐和惠來，以朱姓和溫姓族人為主。蘭芳公司除了梅縣人是之外，也有部分來自大埔。田霖公司成員則主要來自河

34 〈印尼勿里洞的悲慘華工史：僑胞客死異鄉〉，收入「中國評論新聞網」網站：<http://hk.crntt.com/doc/1010/7/4/9/101074982.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1074982&mdate=0912112455>（2018年5月10日點閱）。

35 〈聽印尼作家談家族故事：為什麼一個印尼的島上，會有這麼多的客家人？〉，收入「關鍵評論」網站：<https://asean.thenewslens.com/article/42007>（2018年5月12日點閱）。

婆地區。從中可見客家社群在當地的主導地位。³⁶ 此外，1897 年荷蘭人 S.H. Schaank 已經在加里曼丹西部地區從事陸豐方言田野調查³⁷，可見陸豐客家人在西加里曼丹所佔的地位是很重要的。³⁸ 當然，當地客家人並非全然從事採礦業，根據 Heidhues 的研究，也有不少客家人從事礦業周邊的服務及生產，例如市集的糧食買賣、勞力活動等。³⁹

本區社會現今還是以客家人為主，因此仍然保有濃厚的客家風情，包含食物、語言、民俗文化等。⁴⁰ 也因為文化相近，當地也成為臺灣客家地區男性尋找外籍配偶的首選。⁴¹

在了解 19 世紀初期南洋地區的發展背景之後，大概可以了解彭氏在 19 世紀初移民當時，荷印提供了許多的就業機會，特別是當地的錫礦和金礦產區，這些產業型態都具有勞力密集的特性，對於勞力有著龐大的需求，因此不難理解他們離開臺灣最終落腳荷印的原因。

捌、彭瑞瀾兄弟在南洋的可能落腳處

一、崖城

至於他們到達的地點，據河田彭氏祖譜所載，具有兩處。首先是指彭瑞

36 Heidhues, Mary F. Goldiggers, *Farmers, and Traders in the "Chinese Districts" of West Kalimantan, Indonesia* (New York: Southeast Asia Program Publications, 2003), pp. 63-64。

37 Schaank, S. H., "Het Loeh-Foeng dialect(陸豐方言)," *Toung Pao*, 8: 4, 1897: 437-438.

38 參見羅英祥，《飄洋過海的客家人》（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4），頁 49-64。

39 Heidhues, Mary F. Goldiggers, *Farmers, and Traders in the "Chinese Districts" of West Kalimantan, Indonesia*, p. 72。

40 Tanggok, Muhammad Ikhsan. 〈The Thatung Performances in Cap Go Meh (Lantern Festival) in Singkawang, West Kalimantan-Indonesia〉，收錄於林開忠主編，《客居他鄉：東南亞客家族群的生活與文化》（苗栗：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國立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2013 年）。頁 26-46；Widodo, Johannes, 〈Typological and Morphological Adaptions of Hakka Diaspora's Settlements in Cosmopolitan Southeast Asia: West Kalimantan case〉，收錄於林開忠主編，《客居他鄉：東南亞客家族群的生活與文化》，頁 242-252。

41 Tanggok, Muhammad Ikhsan. 〈The Thatung Performances in Cap Go Meh (Lantern Festival) in Singkawang, West Kalimantan-Indonesia〉，頁 29。

瀾先與其他四位兄弟是從廣東到「印尼崖城」謀生。從文字上，該文字很可能是後來添補的，由於過去荷屬東印度群島並未有「印尼」之稱，而多稱「荷印」，直到 1946 年印尼獨立之後，此用法才逐漸普及。因此「印尼崖城」比較不可能是清代的寫法，而更像是後人在編族譜的時候根據口述而附加上去的。由於印尼首都雅加達（Jakarta）舊稱「椰城」，當地人都以福建話發音為「*iâ-siâⁿ*」，該地地名以普通話詮釋的話，也雅化及簡稱作「雅城」，因此現今無論是以福建話或是普通話詮釋，椰城、⁴²雅城都與「崖城」讀音一致，通漢語拼音的 yá，因此族譜所載的崖城可能就是雅加達。

二、金山邦嘎沙里洋

根據河田耆老的說法，彭氏兄弟後代從印尼搭錢回來的地名相傳為「金山邦嘎沙里洋」，本文推測該地地名所屬地區有兩個可能性。根據微博網路及世界彭氏宗親會聯誼會提供的資訊，設法了解彭氏父子可能落腳的地方。印尼地圖上有兩處地名發音與「*pang-kat*」相近，其一為邦加島（Bangka Island），在「邦加勿里洞」省內。一為「三口洋邦嘎」，在西加里曼丹。這兩個地方，均流行五華話及陸豐客家話。

（一）邦加島

邦加與邦嘎相通，可作為 Bangka 的音譯。邦加島北部有一個主要聚落名為勿里洋（Belinyu），此外當地東岸也有一個稱為理洋（Baturusa）⁴³的聚落，兩者都是邦加島的錫礦產區。⁴⁴但並未見到沙里洋的地名。惟與推論相悖的是，邦加島產錫礦，不產金，與「金山」的說法不符，而邦加島也較少寫作「邦嘎」。

42 直接用普通話詮釋福建話，就會作雅城。

43 Baturusa 的中文譯名可見傅吾康主編，《印度尼西亞華文銘刻彙編·第 1 冊·蘇門答臘島》（新加坡：南洋學會，1988 年），頁 478。

44 Heidhues, Mary F. Somers, *Bangka tin and Mentok pepper: Chinese settlement on an Indonesian Island*, p. 19。傅吾康主編，《印度尼西亞華文銘刻彙編·第 1 冊·蘇門答臘島》，頁 478。

（二）西加里曼丹

西加里曼丹（West Kalimantan）在 19 世紀彭氏兄弟南來時，是整個東南亞著名的金礦產地，而該區重要的礦區 Pemangkat 華人也寫作「邦嘎」，故符合金山邦嘎的說法。至於沙里洋，該地現有的紀錄上並無此地名。另據世界彭氏宗親會的彭孟君說，此地有不少彭姓人士。⁴⁵而根據馬來西亞柔南彭氏公會八週年的紀念特刊所載，也見到西加里曼丹坤甸彭氏公會所寄來的賀詞。

從上述的討論當中，我們還是無法確定彭氏兄弟最終落腳何處，但不可否認的是，上述兩地區都是印尼礦產區，也是印尼的客家地帶。另外也可知道他們在荷印的發展路徑，即先從廣東乘船至荷印雅加達，再輾轉往邦加或西加里曼丹這些產礦且勞力需求高的客家地帶去發展。至於遷徙細節，有待彭氏後裔出現後，才有機會證實，據原鄉族人稱在 1949 年中國解放後已經完全失聯。雖然透過世界彭氏宗親會的網絡關係，也無法尋得彭瑞瀾兄弟的後人，加上年代久遠，這些資訊也因遷徙及通婚等因素而逐漸淹沒了。

雖然我們暫時無法找到彭瑞瀾兄弟後人，但是在東南亞尋找的過程中，研究也藉由本區彭氏宗親會找到現今彭氏族人在東南亞的分布情形。

玖、東南亞彭氏族人的分布

一、東南亞彭氏族人聚居的區域與彭氏宗親會的分布地點

東南亞彭氏族人主要集中於馬來半島南部、廖內群島以及西加里曼丹一帶的範圍，分屬於新、馬、印三國。雖然這些地區分屬不同的國家，看似難以相提並論，但是在過去的馬來亞柔佛和新加坡一帶，當地社會與邦加和西加的往來關係密切，這些地區和新加坡的關係甚至也比雅加達來得密切，地緣上屬於一個整體。例如在邦加島方面，自從新加坡開埠成為南洋的貿易中

45 研究者於 2017 年 7 月 6 日透過 WeChat 通訊的訪談資料。

心之後，它們的錫礦、胡椒等物產的出口，⁴⁶ 華工的輸入，其目的地與來源都是新加坡。另根據 Heidhues 對於西加里曼丹的研究，該地區的礦產、橡膠等物產的往來也都依賴新加坡，當地礦區的天地會組織也與新加坡有關，與爪哇的關係反而較為疏離。此外，西加里曼丹許多的富商、公司也都設點或是遷居到新加坡，而這樣的情況在西加金礦沒落之後，尤其顯著。⁴⁷

與新加坡唇齒相依的柔佛（Johor）也一樣，柔佛客家地區也不乏從印尼二次移民而來的客家人。⁴⁸ 柔佛客家地區的重要市鎮士乃（Senai），其開發者黃炳南便是從勿里洞島（Belitung）移民過來的礦主，⁴⁹ 他也引進了許多的客家鄉親，使得當地的河婆黃姓成為地方重要姓氏。由此可知，邦加及西加對本研究所討論的地區，關係非常密切。

經過了解，彭氏無論是在印尼、馬來西亞或是新加坡，都不屬於常見的姓氏，因此人數相對少。雖然如此，但彭氏族人在空間上相當集中，柔佛正好就是彭姓族人重要的聚集地。由於人數較集中，這些地區的彭氏人近年來也陸續成立了彭氏宗親會，並且相互往來。

在本區域擁有彭姓宗親會，且組織之間有相互往來的地方包括印尼廖內的新及（Singkep）、韋族，⁵⁰ 爪哇（Jawa）的雅加達、望加錫（Makassar），西加里曼丹的坤甸（Pontianak），以及新加坡、馬六甲、雪蘭莪及聯邦直轄區、彭亨（Pahang）、檳城（Penang），砂拉越的古晉（Kuching）、美里（Miri），沙巴的斗湖（Tawau）。而單是在柔佛內陸，便有三個彭氏宗親會，

46 有關邦加華商新加坡之間密切的貿易往來關係的敘述，可參見金門籍的邦加華商陳仲水的報告，見江柏煒，〈印尼邦加島的陳仲水家族〉，收入「金門日報」網站：<http://www.kmdn.gov.tw/1117/1271/1275/256976/>（2018年5月12日點閱）。

47 Heidhues, Mary F. *Goldiggers, Farmers, and Traders in the "Chinese Districts" of West Kalimantan, Indonesia*, pp. 85, 107, 142-143。另，李光耀的外祖父的第三任妻子便是來自西加里曼丹。此外，新加坡開埠之後，最早到的一批客家人也是梅縣客家人。

48 例如昔加末武吉仕砵的客家村，見後節彭城強的案例。

49 根據本研究的田野調查，黃炳南去世之後也安葬在柔佛首府新山。

50 韋族位在印尼廖內，是該群島內的小地名，具體地點及印尼文地名不詳。

分布於古來（Kulai）、昔加末（Segamat）、居鑾（Kluang）（圖 5）。⁵¹ 其中，昔加末武吉仕砵新村（Bukit Siput）（紅牌新村）更是以彭姓為大姓的聚落，根據報導，近八成的居民都姓彭。⁵² 此外，世界彭氏宗親聯誼會也在當地發起，永久秘書處也位在昔加末。這些都是在內陸沿著馬來亞鐵路和聯邦道一號而分布的城鎮，也是客家人聚居的客家帶。這些組織大多是在戰後成立，因此時間較晚（表 2）。此外，本區不少彭姓人家至今也會將自己的堂號匾額掛在大門上，相當具有家族意識，圖 6 中的「信述堂」便是與陸豐彭瑞瀾家族的堂號相同。

表 2 新、馬、印地區彭氏宗親會的分布及成立年代

地方	宗親會名稱	成立年代	地方	宗親會名稱	成立年代
檳城	檳城彭氏聯宗會	1994	古晉	砂拉越彭氏公會	1982
彭亨	彭亨州彭氏聯宗會	2014	美里	美里彭氏宗親會	2005
新加坡	新加坡彭氏總會	1952	斗湖	沙巴斗湖彭氏宗親會	1961
馬六甲	馬六甲彭氏宗親會	2003	坤甸	印尼西加坤甸彭氏宗親會	2001
雪蘭莪及聯邦直轄區	雪蘭莪及聯邦直轄區彭氏聯宗會	1955	雅加達	彭氏宗親會	1982
古來	柔南彭氏宗親會	1997	新及	印尼新及（廖內）宗祠理事會	不詳

51 各彭氏宗親會成立的時間參閱昔加末彭氏聯宗會編，《二零一六年昔加末彭氏聯宗會成立六十周年紀念特刊》（昔加末：昔加末彭氏聯宗會，2016 年），頁 41。

52 見〈別有村天：土基央國會選區（上篇）·品味歷史文化·紅牌新村哪堪往事回首·武吉思砵煙囪猶存風光不再〉，收入「星洲網」網站：<http://www.sinchew.com.my/node/997747>（2018 年 4 月 12 日點閱）。

昔加末	昔加末彭氏宗親會	1956	韋族	印尼韋族 - 廖屬 彭氏宗親會籌委會	不詳
居鑾	居鑾彭氏聯宗會	1999	望加錫	印尼錫江彭氏永和基金會	不詳

資料來源：

1. 柔南彭氏宗親會，《柔南彭氏宗親會成立八周年紀念特刊》（古來：柔南彭氏宗親會，2005 年）。
2. 彭錦洸，《馬來西亞雪直彭氏聯宗會成立六十周年特刊紀念特刊》（吉隆坡：雪直彭氏聯宗會，2015 年）。
3. 昔加末彭氏聯宗會編，《二零一六年昔加末彭氏聯宗會成立六十周年紀念特刊》（昔加末：昔加末彭氏聯宗會，2016 年）。
4. 新加坡彭氏總會，《新加坡彭氏總會三慶紀念特刊：第五屆世界彭氏宗親聯誼大會暨彭氏大廈落成典禮慶祝四十九周年紀念》（新加坡：彭氏總會，200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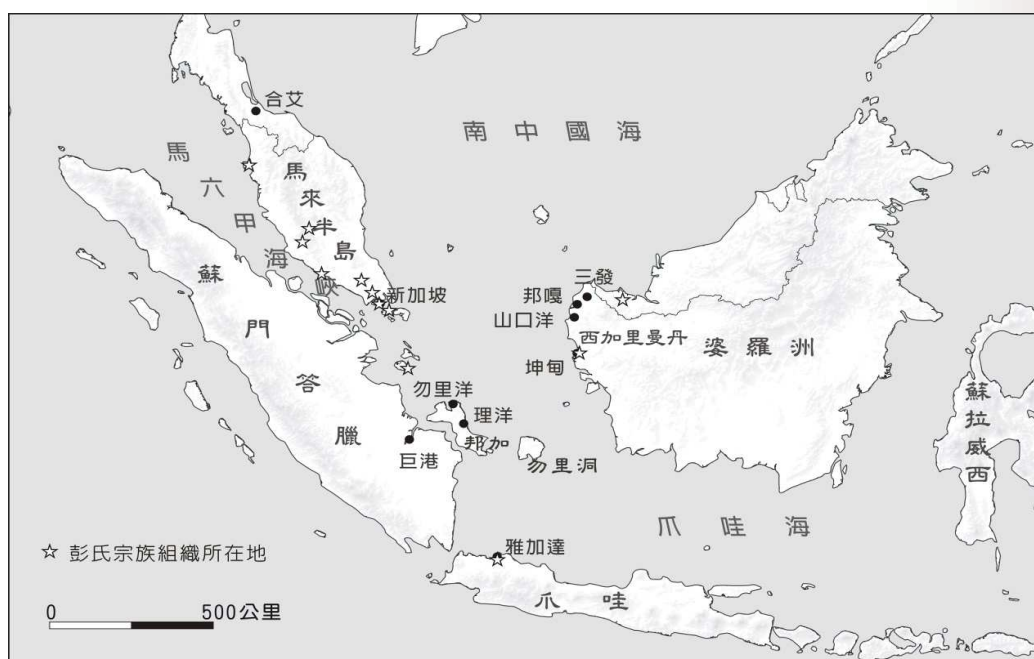


圖 5 現今彭氏家族在東南亞的聚居地

註：邦加、西加里曼丹為彭氏兄弟在南洋可能的落腳處。

資料來源：彭霖貴編，《新加坡彭氏總會成立四十周年紀念特刊》（新加坡：彭氏總會，1993 年）；昔加末彭氏聯宗會編，《二零一六年昔加末彭氏聯宗會成立六十周年紀念特刊》（昔加末：昔加末彭氏聯宗會，2016 年）



圖 6 馬來西亞柔佛州古來新村彭姓人家大門上的堂號匾額

說明：述信堂為陸豐縣吉康都彭姓所用堂號之一。

資料來源：白偉權攝，2018 年 5 月 11 日。

另外在這些彭氏族人的族群（方言群）身分方面，根據柔南彭氏宗親會的資料，彭姓在地方上多為客家人，而與之往來的各地彭氏宗親，也多為客家人。我們雖然無法確定其他地區彭氏族人屬於哪個原鄉的客家人，但根據本研究在柔佛古來兩座華人老義山（古來山、古來華人義山亭）針對彭姓墓碑的調查，⁵³ 共見到 13 座彭氏墓碑，其中見到廣西 1 座、惠州 2 座、高州 1 座、陸豐共有 9 座，其中敘明詳細祖籍地五雲的共有 6 座。雖然研究所蒐集到的墓碑不多，但從顯著的趨勢看來，彭氏當中又以陸豐彭氏為多。另一方面，柔南彭氏宗親會的特刊在簡介原鄉地景時，也以陸河縣河田的商賢家廟為題，顯見陸豐彭氏在本區人數上的優勢。從雪蘭莪及聯邦直轄區彭氏聯宗會的特刊當中也顯示，當地彭氏族人回鄉祭祖尋根時，也會到揭西受章公的祖墳祭拜，其特刊所記載的排輩也與彭瑞蘭家族陸豐硤頭祠資料的相吻合，即第 17 世的禹，18 世的湯，19 世的文，以及 20 世的武。⁵⁴ 事實上，根據中

53 此次墓碑調查是採取抽樣的方式，針對該作義山可及的區塊進行巡視，尋找彭氏的墓碑。

54 彭錦光編，《馬來西亞雪直彭氏聯宗會成立六十周年紀念特刊》（吉隆坡：雪直彭氏聯宗會，2015 年），頁 75、78、92。

國原鄉的資料，彭姓人口佔陸河縣總人口 18%，⁵⁵ 是全縣第一大姓，但這一數據還未包括 1965 年劃割給揭西縣五雲鎮的彭氏祖地，若將五雲算入的話，比例將會更高。因此，南馬地區所找到的彭氏族人，基本上與彭瑞瀾家族屬於同一個支系。

二、東南亞半山客及彭氏族人的社會概況

本區的彭氏家族主要來自海豐、陸豐（特別是河婆）、豐順等地，在社會上多被歸類為半山客。在整個馬來亞、印尼以方言群為主要分類的華人社會當中，這些半山客在經濟上並未佔有優勢地位，在客家族群當中，他們也沒有像嘉應州及惠州客家人一樣，在錫礦產業上佔據優勢地位。在彭氏宗親的角度而言，本區也未有出現彭姓的礦家或巨商，因此無論是在方言群或幫群上，或是姓氏組織上，彭氏宗親都不算是強勢群體。這樣的處境其實與 19 世紀彭瑞瀾兄弟南來謀生所面對的處境相當一致。

從整個東南亞華人社會的角度觀之，客家人雖然人數多，但是在經濟上他們並非強勢族群，他們雖然主導了內陸地區的礦產開發，但是在產品的產銷鏈當中，除了金字塔頂端的礦主之外，經濟利益往往由扮演大盤商角色的福建人、廣府人、⁵⁶ 潮州人⁵⁷ 所佔。而本研究所討論的彭氏家族，無論是陸豐或是豐順，都屬於半山客，他們在當地屬於客家主流社群的邊緣，在產業上不像梅縣客或是惠州客一樣在礦業當中屬於主流社群，⁵⁸ 也不像大埔人一樣在市街中從事醫藥、打鐵、典當等商業活動。他們大多從事一些鄉村工作，例如種菜、割膠等勞力工作。同時，這些半山客也不被福佬人或潮州人所接納。

55 2005 年陸河縣人口調查，全縣人口 28,8396 人，彭姓人口共有 51,332 人。據彭永琴主編，《客家陸河》（陸河：陸河縣政府，2006 年），頁 342-361。（「陸河縣姓氏分布情況一覽表」之各鄉鎮姓氏資料計算所得。）

56 馬來半島礦區的經驗。

57 西加里曼丹礦區的經驗。見 Heidhues, Mary F. Goldiggers, *Farmers, and Traders in the "Chinese Districts" of West Kalimantan, Indonesia*, p. 73。

58 雖然惠州與梅縣人內部的貧富差距亦相當大，但由於社群領袖經濟實力強，因此所能提供的社會福利照顧也較多。

在氏族方面，從彭氏宗親會的成立時間看來，他們凝聚的時間較晚，直到一些彭氏宗親事業有成之後才逐漸成形。⁵⁹與東南亞許多的控制地方資源⁶⁰的大型宗族相比，力量薄弱。彭氏家族也未出現足以拉拔整個氏族的巨商，⁶¹因此彭姓族人在南來打拼的過程中，需要從底層一步步累積，生活較為艱苦。

總體而言，由於彭氏兄弟南來時間非常早，至今已有百餘年，不過以目前所掌握到的些微資訊，可以得知彭瑞瀾家族在海外並未完全斷絕，至少到 1950 年代以前還有「搭錢」回鄉祭祖，只是因為之後的因為兩地的政治問題而與原鄉失去聯繫。不過至少從東南亞彭氏族人的考察，我們似乎又能夠多少對彭氏兄弟在南洋的生活範圍、所處的社會概況有所了解。

從東南亞彭氏所聚集的地帶以及他們的祖籍身分可以得知，本區彭氏族人都集中在馬來半島南部（含邦加及廖內群島）及西加里曼丹一帶，且以陸豐籍為主流，此一事實幾乎都能夠與彭瑞瀾兄弟的南來的流動範圍（從雅加達至邦加—廖內或西加里曼丹）與祖籍身分相互對應，也符合南來移民同族相招、同族相聚的原則。而從彭氏族人在華人社會當中的社會屬性觀之，彭氏族人無論在族籍身分或是姓氏組織上，在當地都屬於邊緣社群。在彭氏族人現今的分布及族群身分有較明確的人事之後，這些資訊都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彭瑞瀾兄弟南來之後的情形。

拾、結論

臺灣既屬於移民社會，又是內地社會的延伸，但它不像閩粵地區一樣，

59 參見：彭博著，《歲月山河：一個南洋移民的奮鬥史》，（新加坡：新加坡彭氏總會、南洋彭氏宗親會，2010年）。

60 例如新加坡柔佛地區的潮州陳氏、余氏控制了本區很大一部份的胡椒甘蜜產業。胡氏掌控了霹靂近打地區很大一部份的錫礦產業等。荷印地區的瑪腰、甲必丹家族亦屬此類。

61 例如增城籍馬來亞錫礦主鄭景貴為首的鄭氏家族、永定籍的胡子春、虎豹兄弟等人為首的胡氏家族等，他們都為底下氏族提供了許多的垂直爬升機會。

與南洋華人社會有密切的往來，進而與南洋華人社會有直接的關係。然而作為一個閩粵移民社會，人們與原鄉之間的是具有高度流動性的，許多人仍然往返唐山。回到唐山之後，也容易因為家族內部的網絡，而與南洋產生聯繫。查閱現今許多的族譜，都不難發現到一個家族中不同的兄弟遷往不同的目的地，例如本研究所蒐集到的東海祠堂徐氏歷代族譜當中，便見到一位宗達公底下的三個兒子，子貴公往臺灣發展、兄弟子坤公則下南洋。⁶²雖然在資料尚無法確定這些來臺祖是否有後人輾轉移民到南洋，但是透過〈渡臺悲歌〉的彭氏兄弟的案例，來臺後再出洋的情形亦不容忽視。臺灣—東南亞的遷移也是臺灣客家二次移民研究範疇中，較少為人所留意的。因此研究希望納入東南亞的經驗，以豐富臺灣客家族群特質相關討論的多元性。

將渡臺悲歌的歌詞，連結彭氏渡臺切結書及兩岸彭氏家譜，做過分析與比對後，得知其中的人、地、時、事、物諸因素，是彼此貫通而且互為因果。經過本研究前往原鄉河田的訪查，發現這些文件所記載的內容，是陸豐河田彭氏家族渡臺不久後，彭瑞瀾又帶領長子彭堯松遠漂印尼，謀求更好的生活，也是本研究標題上「下南洋」的故事。留守新竹家園的次子彭堯梅，在父兄離家未歸之際，以弱冠之年撐起全家生活重擔，確實不容易。感慨生不逢時、歲月弄人，乃作渡臺悲歌。

陸豐彭家下南洋先前往印尼的雅加達後，再輾轉遷往他處，推測他們在印尼最終的落腳處可能有二；一為邦加島（Banka），另一為三口洋的邦嘎（Pemangkat Singkawang），因為兩地華人圈客家話均深受海陸腔影響。推測「邦加」，乃因邦加是有名的錫礦產區，早期華人契約移工甚多，邦加之地名也鑲嵌在「金山邦加邦嘎沙里洋」中的邦加沙里洋。另一推測「邦嘎」，源於三口洋的三發河流域曾盛產沙金，又是「蘭芳共和國」頂盛時期，與陸豐耆老所言「金山邦嘎沙里洋」中的金山邦嘎有音義類似之處。彭瑞瀾與長子及原鄉另三位兄弟，很可能留居在這兩處具有海陸豐傳統的客家聚落，但印尼幅員廣大，這兩百年中，他們也可能遷徙到更好的地方去謀生了。

62 徐茸輝編，《東海祠堂徐氏歷代族譜》（桃園：東海祠堂，1996年），頁82。

兩岸族譜有記載遷移臺灣、浙江、四川等地，也有記載「某公遠出異鄉未詳其後」，可能往海外移民去了。⁶³ 若經過三、四代未返故鄉，則後裔在語言、文化、風俗、婚姻各方面都與原鄉差異甚大，產生隔閡而疏遠。至目前為止，這宗彭姓家族，在最近一百多年來，已經失聯了，筆者謹在此做學術討論而已。

我們透過東南亞世界彭氏宗親聯誼會的網絡試圖找尋彭瑞瀾後人，雖未有結果，卻發現柔佛、新加坡、邦加及西加里曼丹這個範圍內擁有相當多的客家彭氏宗親，而該區一帶在社會上又與印尼彭瑞瀾家族可能落腳的地方往來關係密切，在人文地理上亦屬於同一個整體。從地方史的角度觀之彭氏族人無論是在姓氏或是族群身分（方言群／幫群）上，都屬於地方上經濟能力較為薄弱的小眾群體，彭瑞瀾當年應該也離不開這樣的社會處境，這些移植經驗都能夠幫助我們想像彭瑞瀾家族南來之後所可能遇到的境遇。

63 桃園觀音鄉新坡村徐氏族譜。

參考書目

一、檔案、史料彙編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戊編第二本》。臺北：中央研究院，1954 年。

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年。

昔加末彭氏聯宗會編，《二零一六年昔加末彭氏聯宗會成立六十周年紀念特刊》。昔加末：昔加末彭氏聯宗會，2016 年。

柔南彭氏宗親會，《柔南彭氏宗親會成立八周年紀念特刊》。古來：柔南彭氏宗親會，2005 年

莊吳玉圖編，《彭氏大宗譜》。桃園：百族姓譜社出版，2008 年。

傅吾康主編，《印度尼西亞華文銘刻彙編·第 1 冊·蘇門答臘島》。新加坡：南洋學會，1988 年。

彭氏水唇籍敦親睦族基金會編，《延年頌》。陸河：彭氏水唇籍敦親睦族基金會，2005 年。

彭發勝，《勸君切莫過臺灣》。漢學教材由九芎林工作坊羅文生數位化存檔，1938 年。

彭錦洸，《馬來西亞雪直彭氏聯宗會成立六十周年特刊紀念特刊》。吉隆坡：雪直彭氏聯宗會，2015 年

彭霖貴編，《新加坡彭氏總會成立四十周年紀念特刊》。新加坡：彭氏總會，1993 年

新加坡彭氏總會，《新加坡彭氏總會三慶紀念特刊：第五屆世界彭氏宗親聯誼大會暨彭氏大廈落成典禮慶祝四十九周年紀念》。新加坡：彭氏總會，2002 年。

聶德寧，《公案簿，第 7 輯》。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7 年。

二、專書與專書文章

孟祥翰，〈日治時期花蓮地區客家移民的分布〉，《客家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中心，2002 年），頁 129-158。

林秀昭，《臺灣北客南遷研究》。臺北：文津，2009 年。

胡捷、何忠蓮編，《新世紀廣東省地圖集》。廣州：廣東省地圖出版社，2007 年。

徐茸輝編，《東海祠堂徐氏歷代族譜》。桃園：桃園縣觀音鄉新坡下東海祠堂，1996 年。

彭永琴主編，《客家陸河》。陸河：陸河縣客家文化集編小組，2006 年。

彭博，《歲月山河：一個南洋移民的奮鬥史》。新加坡：新加坡彭氏總會、南洋彭氏宗親會，2010 年

黃菊芳，《臺灣客家民間敘事文學：以渡臺悲歌與渡子歌為例》，臺北：南天書局，2014。

黃榮洛，《渡臺悲歌：臺灣的開拓與抗爭史話》。臺北：臺原出版社，1989 年。

鍾肇文，《客家人移民臺灣中南部史》。屏東：梁慧芳出版，2009 年

羅英祥，《飄洋過海的客家人》。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4 年。

羅烈師，〈臺灣客家分布與島內遷徙之再討論：以饒平篤祜堂七藍周姓彰化平原移民北遷新竹湖口為例〉，收錄於莊英章、黃宣衛主編，《客家移民與在地發展》（南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18 年），頁 165-192。

三、期刊論文

洪馨蘭，〈臺灣屏東市頭分埔北客的聚落化過程及其能動性〉，《全球客家研究》第 5 期（2015 年 11 月），頁 35-84

徐勝一、范明煥、韋煙灶，〈清代陸豐客家渡臺的歷程—〈渡臺悲歌〉及〈渡臺帶路切結書〉的聯想〉，《新竹文獻》第 63 期（2015 年 10 月），頁 53-78。

黃菊芳，〈客語抄本〈渡臺悲歌〉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8 年。

黃學堂，〈日治時期臺東地區的客家人〉，《臺東文獻》（復刊）（第 10 期，2004 年），頁 3-29。

曾學奎，〈臺灣客家〈渡臺悲歌〉研究〉，新竹：新竹師範學院中文學系碩士論文，2003 年。

潘繼道，〈漫談東臺灣客家移民史〉，《臺灣學通訊》第 17 期（2008 年），頁 2-3。

賴文慧，〈臺灣汀州客二次移民研究：以苗栗縣造橋鄉平興村謝姓家族為例〉，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9 年。

四、網路

〈印尼勿里洞的悲慘華工史：僑胞客死異鄉〉，收入「中國評論新聞網」網站：<http://hk.crntt.com/doc/10107/7/4/9/101074982.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1074982&mdate=0912112455>（2018 年 5 月 10 日點閱）。

〈別有村天：士基央國會選區（上篇）·品味歷史文化·紅牌新村哪堪往事回首·武吉思砵煙囪猶存風光不再〉，收入「星洲網」網站：<http://www.sinchew.com.my/node/997747>（2018 年 4 月 12 日點閱）

江柏煒，〈印尼邦加島的陳仲水家族〉，收入「金門日報」網站：<http://www.kmdn.gov.tw/1117/1271/1275/256976/>（2018 年 5 月 12 日點閱）

林文映，〈印度尼西亞客家巡馬〉，收入「香港客家文化研究會」網站：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MDM3Njc5MA==&mid=403440263&idx=1&sn=466ff1945196363fef656cbeb06a4d29&scene=2&srcid=0227qz0P2OOmhnbpUIvpewSB&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wechat_redirect（2018 年 5 月 10 日點閱）

聽印尼作家談家族故事：為什麼一個印尼的島上，會有這麼多的客家人？》，收入「關鍵評論」網站：<https://asean.thenewslens.com/article/42007>（2018 年 5 月 12 日點閱）。

客家電視臺，〈作客他鄉 第 10 集（印尼西加）〉，收入「youtube」網站：<https://m.youtube.com/watch?v=G5BKysfhzVc>（2018 年 5 月 10 日點閱）

新加坡豐順會館，〈關於本館〉收入「新加坡豐順會館」網站：<http://www.foongshoon.org/> 关于本馆（2018 年 5 月 10 日點閱）。

五、英文

Heidhues, Mary F. Somers, Bangka tin and Mentok pepper: Chinese settlement on an Indonesian Island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2)。

Heidhues, Mary Somers, Golddiggers, Farmers, and Traders in the “Chinese Districts” of West Kalimantan, Indonesia (New York: Southeast Asia Program Publications, Cornell University, 2003)

Schaank, S. H., “Het Loeh-Foeng dialect(陸豐方言),” T'oung Pao, 8: 4, 1897: 437-438.

Tanggok, Muhammad Ikhsan. 〈The Thatung Performances in Cap Go Meh (Lantern Festival) in Singkawang, West Kalimantan-Indonesia〉，收錄於林開忠主編，《客居他鄉：東南亞客家族群的生活與文化》。苗栗：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國立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2013 年，頁 26-46。

Widodo, Johannes, 〈Typological and Morphological Adaptions of Hakka Diaspora' s Settlements in Cosmopolitan Southeast Asia: West Kalimantan case〉，收錄於林開忠主編，《客居他鄉：東南亞客家族群的生活與文化》。苗栗：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國立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2013 年。頁 242-252。

A Lufeng Hakka's Voyage to Nanyang: Sequel to 'Bitter Passage to Taiwan'

Wee-Chuen Pek*

Yen-Tsao Wei**

Sheng-I Hsu***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Hakka people's migration from southeastern provinces of China to Taiwan and Southeast Asia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one aspect we cannot overlook is that for many migrant Hakka ancestors, they often had to relocate themselves from place to place many times before they could settle down finally in a more suitable new environment to make a living. Yet in the unusual case of the Peng Hakka family in Hsinchu, Taiwan, the situation created by remigration of family members was more complicated. In recent years, Taiwan's folk songbook named 'Bitter Passage to Taiwan' (渡臺悲歌) circulating in the vicinity of Hsinchu county, had been speculated as a sorrowful ballad incurred from a Hakka secondary migration and was written by an educated teenager who expressed his grief and discontent about the settling environment in Taiwan. According to a signed agreement made by a Peng's family of nine members and a tour guide, we believe that this lyrics was written by Peng Yaomei (彭堯梅), the second son of the family. His father Peng Ruilan (彭瑞瀾) and elder brother Peng Yaosen (彭堯森) went back to the native hometown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Malaysia.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Retir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o search for job opportunities but never returned, as consequence, Yaomei and his mother and other siblings lived in dire poverty in Hsinchu. He wrote this lyric around 1825 and completed before 1834 as extrapolated from the evidence shown in the related documents.

The Peng ancestral house in Hetian (河田), Lufeng county (陸豐縣) kept a record indicating that Peng Ruilan and his three other brothers had migrated to Jakarta Indonesia (椰城). The shared costs for ancestors worshipping from four Indonesia descendants were received regularly by the ancestral house in Hetian until 1949. They are said to be living in a place like 'Jinshan Banga' (金山邦嘎). This article seeks to visit the areas where Lufeng dialect prevails and where Peng clan lives in Southeast Asia, with a hope that the descendants of Peng brothers might show up finally.

Attempt to locate the missing descendants of Peng brothers seems to progress very little at the moment due to their low social status and lack of documented information. However, they may appear somewhere in the Peng's clan associ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such as in Riau, in the southern Malay Peninsula and in the West Kalimantan. Immigrants in these areas are not only closely related with each other but also are shared with the same historical context from the same origin of Lufeng. Through collecting Peng clan albums and analyzing the ancestral identity of Lufeng people, perhaps will help us to get the bigger picture of the colonial society the Pengs and the Hakka community as a whole fit into.

Keywords : Bitter Passage to Taiwan, Migration of Hakka, Lufeng Hetian, secondary migration, Hakka of Southeast Asia